

国民阅读
经典

法国大革命讲稿

〔英〕阿克顿 著 高望 译

中华书局



法国大革命讲稿

〔英〕阿克顿 著 高望 译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讲稿/(英)阿克顿著;高望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14.7

(国民阅读经典)

ISBN 978-7-101-09863-1

I. 法… II. ①阿…②高… III. 法国大革命-研究
IV. 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7713号

本书译文版权由启蒙编译所授予

-
- 书 名 法国大革命讲稿
著 者 [英]阿克顿
译 者 高 望
丛 书 名 国民阅读经典
责任编辑 聂丽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北京第1版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3 $\frac{1}{8}$ 插页2 字数32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863-1
定 价 34.00元
-

出版说明

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国民的阅读生活中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阅读经典！

在承担着国民基础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基础教育被功利和应试扭曲了的今天，我们要阅读经典；当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占领人们的头脑、占用人们的时间时，我们要阅读经典；当中华民族迈向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时，我们更要阅读经典。

经典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精神世界的家园，是走向未来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的缘起，也因此决定了这套丛书的几个特点：

首先，入选的经典是指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名著。世界的目光、历史的观点和中国的根基，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第二，入选的经典，不是指某时某地某一专业领域之内的重要著作，而是指历经岁月的淘洗、汇聚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创造和

知识积累的基础名著，都是人人应读、必读和常读的名著。我们从中精选出一百部，分辑出版。

第三，入选的经典，我们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尽量选择最好的版本，选择最好的注本或译本。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经典丛书能够进入你的生活，相伴你的左右。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四月

原编者说明

本书的文章来源于阿克顿爵士在担任剑桥大学钦命近代史教授期间，于 1895~1896、1896~1897、1897~1898、1898~1899 年使用过的讲课稿。1789 至 1795 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当时剑桥大学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特别科目之一，由此决定了课程的范围。此外，通常还会以课堂讨论或额外讲座的形式讨论一些法国大革命的文献。与此相关的断章以附录的形式在本书末尾发表。各讲的标题均由编者拟定。

J. N. 菲吉斯
R. V. 劳伦斯
1910 年 8 月 10 日

原编者说明·····	1
第一章 革命的先兆·····	1
第二章 美国的影响·····	23
第三章 三级会议的召集·····	41
第四章 三级会议·····	59
第五章 网球场誓约·····	71
第六章 巴士底狱陷落·····	81
第七章 八月四日·····	101
第八章 宪法辩论·····	115
第九章 进军凡尔赛·····	133
第十章 米拉波·····	149

第十一章	西哀士与《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	167
第十二章	瓦雷纳逃亡事件	183
第十三章	斐扬派与战争	201
第十四章	杜穆里埃	219
第十五章	君主政体的灭亡	233
第十六章	处决国王	249
第十七章	吉伦特派的垮台	265
第十八章	恐怖统治	279
第十九章	罗伯斯庇尔	295
第二十章	旺代	313
第二十一章	欧洲战争	329
第二十二章	恐怖之后	343
附录	法国大革命文献	357
	译名对照表	389

第一章 革命的先兆

法国每年的税收已经达到 2 000 万，却仍然不能满足路易十六的胃口，国王要求国民付出更多。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数字就远远超过了 1 亿，国家的总收入则增加得更加迅速；这种增长应当归功于一个阶层，可是古老的君主制度不但拒绝酬答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而且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勤劳改变了财产的分配状况，财富不再是被少数人独占的特权，因此这些受到排斥的多数人意识到，他们处于任人宰割的无力地位是由于国家的不作为，社会没有建立在正当和正义的基础上。他们提出，政府、军队和教会的奖赏理应属于有价值有贡献、为社会所必需的那部分人，应该废除不劳而获的少数人的特权，以免损害他们的权益。他们的人数大约是少数特权阶层的 100 倍，所以他们相信自己实质上是国家的主体，要求自己治理自己，获得与人数相称的权力。他们要求国家进行改革，不是由所谓的主人，而是由他们选择的代表来治理。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它并非从未知之处飞来的流星，而是受各种历史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那些历史因素联合起来，就具有破坏和毁灭的强大力量，可是如果单独分开，又没有进行建设的力量。

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必须花点时间追溯大革命之前的思想观念的轨迹，将其与连续性法则和持久的影响力结合起来考虑。

如果说法国在其他国家成功的地方失败了，如果说法国从封建和贵族制社会向工业和民主社会过渡经历了一场动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么根本的原因不在于那个时代的人，而在于他们所处的背景。即使是专制的国王，只要在国外获胜，也就能被国内民众接受。在几次惨败的间隔时期，少数异见者受到压制，革命思想最初的信号就隐约地潜藏在他们中间。天主教詹森教派的信徒（Jansenist）是忠诚而富于忍耐精神的；不过其中著名的法学家让·多马（Jean Domat）是位哲学家，在当时一片混乱的法理学领域，他的作品使理性恢复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圣·托马斯（St. Thomas）是他所属教派的一位伟大人物，多马从他那里学到，法律应该由人民制定，并且为人民服务，废黜恶劣的国王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责任。他坚持认为，法律的依据应当是常识而不是习俗，应当从永恒的法典中学习戒律。高级法的原则具有革命的意义。只有通过了这个原则的检验与肯定，政府的统治才有效力，它指出了通往原初的、普遍的、不可废弃的权利体系的途径，多马之后的议会法学家们将这种体系加入了宪法章程。

法国国王颁布南特（Nantes）敕令^①以后，新教徒被认定为保王党人，所以即使在撤销该敕令之后，流亡到鹿特丹的培尔（Bayle）仍然倡导信仰自由，继续忠于国王。他的敌手皮埃尔·朱里厄（Pierre Jurieu）虽然在神学方面不宽容，但是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并且受到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的影响，性情接近欧洲大陆

^① 1598年4月13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法国西部的港口城市南特签署颁布敕令，确立了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同时承认新教胡格诺派教徒有信仰自由，享有同等权利，可以出任官职，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后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又在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宣布新教非法。

的辉格党人。他主张最高统治权来自人民，理应归属于人民。国王如果滥用权力作恶，就要被剥夺王冠。国民的权利则不可能被剥夺。只要人民拥有一种无条件合法的权力，即使他们做错事，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朱里厄的煽动性言论经常被提及，雅克 - 贝尼格尼·波舒哀 (Jacques-Bénigne Bossuet) 对此谈论得最多，它们像透明琥珀中的化石一样被保留下来，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后来促成了这样的理论：民主可以无条件地前进，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当时最优秀的基督教会法学家是加布里埃尔 - 尼古拉斯·莫尔特罗 (Gabriel-Nicolas Maultrot)，他在 1790 年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作品，论述人民拥有高于国王的权力，深入地研究了只有他非常熟悉的资料，解释了教会法规是如何支持 1688 年光荣革命的原则，拒斥近代人捏造的君权神授思想。他的作品还更好地解释了大革命时期教士们的心态，以及他们广受欢迎的原因。

在文学领域，反对君权的思想真正来源于弗朗索瓦·芬乃伦 (François Fénelon)^①。他既不是有创新精神的改革者，也不是新真理的发现者；他只是具有格外强的独立意识和敏锐的观察理解能力，他第一个看透了宫廷隐藏在华丽威严的外表下的伪善，并意识到法国正在走向毁灭。在君主国的荣光被阴云遮蔽之前，他的良心已经开始反叛。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的观察对人类进行判断，得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将政府的问题与私人生活的行为一视同仁，用道德的纯粹标准衡量，并且比任何人都走得更远，使用启蒙道德的独有规则来判断一切事情，那是既明晰彻底又十分危险的实践。尽

① 弗朗索瓦·芬乃伦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1651 ~ 1715 年)，法国的天主教神学家、诗人兼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 1699 年出版的《特勒马科斯历险记》(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他在那部小说里几乎不加掩饰地攻击了法国君主。

管他对政治策略和国际关系一无所知，但是他总是能够告诉读者，假想中的完美人类会采取怎样的做法。芬乃伦自认为是信仰基督的欧洲公民，但是他追求的思想与他的国家和教会相互分离，他最深刻的言论如同出自异教徒之口。他强烈地希望既能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信仰，又能和善地对待质疑自己信仰的人。他既不同意教会拥有开除教籍的权力，也不同意惩罚犯错的教徒，他宣称教会最重要的需求不是胜利，而是自由。通过他的朋友弗勒里（Fleury）和谢弗勒斯（Chevreuse），他表示赞成召回新教徒，建议国家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主张世俗权力与宗教事务保持分离，因为国家权力的保护会导致宗教上的奴役，政府的迫害会导致宗教上的虚伪。有时候他好像已经接近了一个从未有人涉足的思想领域的边缘，即政教分离的观念。

芬乃伦写道，历史学家应该在自己国家与别国之间保持中立，并期望政治家也遵守同样的规则，因为爱国主义不能成为免除对人类的责任的借口。任何战争都不是正义的，除非是纯粹为了自由而被迫参与的战争。芬乃伦希望法国主动放弃通过不正当手段占领并为之骄傲的土地，尤其应当撤出西班牙。他断言西班牙人堕落而低能，但是那并不能成为破坏势力均衡和威胁其国家安全的正当理由。在他眼里，荷兰是欧洲的希望之星，组织同盟军把法国统治者驱逐出西班牙是合理的，由于同样的原因，菲利普二世占领英格兰的要求得不到任何法律的支持。他希望法国采取谦逊的姿态，因为他担忧成功会给性格好胜的法国人带来不好的影响。他相信为了补偿国王的罪过，路易应该废黜自己的孙子，只有那样才是公平的。

芬乃伦断定，权力就是毒药；既然国王几乎都是道德败坏或昏庸无能的家伙，那么他们就不应该进行统治，而只能执行法律。因为遵循先例和习俗是野蛮人的标志，而文明的社会必须通过可靠的法典来管理。惟有宪法能够防止权力的专断。他厌恶和鄙弃路易

十四的专制统治，认为那是造成这个国家的所有灾祸和罪恶的根源。如果将理应属于国民的统治权力交还给国民，法国就能自己运用权力拯救自己；然而绝对的权力将无可挽回地逐渐削弱国家的根基，它将引发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会是温和的，而会彻底摧毁一切。芬乃伦并不希望牺牲君主制度或贵族阶级，他带着忧虑预见到了未来的一些趋势，但是对这些趋势流露出了同情的态度。他承认自然状态，认为公民社会并不是人类的原始状态，而是经历了野蛮生活和农业社会后达到的结果。他认为政府的责任应移交给地方和中央的国民代表大会；要求保证商业贸易的自由；通过法律确立教育制度，因为孩子首先属于国家，然后才属于家庭。对于凭借国会的立法手段使人行善，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还相信可以利用公共机构塑造人的性格，使其与遥远的未来建立密切的联系。

他在精神意义上是革命理论的创始人。人们很少理解他的真实想法，却普遍记住了他的言论；有些人抱怨说，他的力量使人离心离德，国家需要自由与正义，教会也同样需要温和的礼仪和荣誉来维护。人们经常说，路易十六的灭亡是替他的祖先赎罪。他的灭亡不是因为过度使用了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权力，而是因为那种权力的基础已经遭到侵蚀，声名狼藉了。芬乃伦就是败坏王权名声的人。在他之前，波舒哀甚至培尔等最有才干的人都是推崇君主统治的。芬乃伦对王权的讽刺与批判达到了极点，他严厉地对待披着堂皇外衣的路易十四，比伏尔泰（Voltaire）的信徒对待堕落的路易十五的态度更苛刻。他开启了鄙视和羞辱君王的潮流。后世最优秀的人纷纷效仿他，以宗教动机作为反对和批判的基础。他们就像红衣主教杜布瓦（Dubois）描写的喜欢妄想的康布雷（Cambrai）大主教一样，都是不切实际梦想家。不过到了18世纪中叶法国即将遭遇巨变的时候，他们的影响已经消退了。

从那时起，不信上帝的思想变得相当流行，连没有公开攻击过

宗教的人，比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孔狄亚克（Condillac）和杜尔哥（Turgot）^①，也对基督教敬而远之。这种倾向在政治上造成的后果就是，人们认为教会的问题没什么重要意义，对于教会和国家从来没有明确的概念，从来没有认真地考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确立国教或废除国教，什么时候应该捐钱，什么时候可以收税，甚至从来不知道是否存在通用的解决方法，或者决定这些问题的普适原理。在大革命的转折关头，这种知识缺陷成了无法隐藏的事实。国家与教会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宗教宽容的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 18 世纪很少有人探讨这个课题，而且相关的探讨总是断断续续，既面临困境又缺乏科学性。宗教自由是由宗教和自由两种性质构成的，所以在意见领袖那里，构成它的要素从来不是公正客观地观察研究的对象。比起通过论证来确信，他们更喜欢通过争辩去怀疑，他们利用消解神启的手段击败对宗教的不宽容，正如他们凭借消除魔鬼来击败对巫婆的迫害。他们的自由主义仍旧残留着一个缺陷，因为将自由与信仰分离，就等于从自由中抽走了大量的实质性内容。其实问题并没有如此复杂，解决的办法不是那么深奥，也不需要那么激进。那时已经有一些学者稍微触及了答案，后来托克维尔（Tocqueville）^②将其确定为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在宗教尚未拥有自治力量的国家，国民就没有准备好享受自由。

① 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5~1780 年），18 世纪法国哲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对洛克的经验论在法国的传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1 年），劳恩男爵，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即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经济自由主义的早期倡导者之一。曾经担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1774 年至 1776 年间，试图推行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税收政策，失败后被免职。

②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年），法国历

这些早期的改革观念在法国继续发展，试图尽量利用既有的社会制度和议会制贵族统治，复兴由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组成的三级会议和外省的立法机构。但是，如果要沿用过去的制度，在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法国，这种计划必然面临各种阻碍，无论新的制度与机构怎样发展，最后都会停滞不前。如果说中世纪的政体曾经促进了国家的繁荣，那么它的果实一定落入了其他国家之手，因为那些国家已经将早期的改革观念付诸实践并走得更远。法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学习外国的典范并接受熏陶；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18世纪拉开了帷幕。伏尔泰首先正式宣称了英国的优越性，孟德斯鸠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观点。因为英格兰在17世纪创立了一个政府，比停滞在古代的法国的制度更加强大。尽管那个政府是依靠欺诈和叛逆建立起来的，可是它确立了法律的保障作用，比过去存在的那些依靠正统性、继承权和宗教认可建立的政权更加稳固。神学的争执不会削弱国家的力量，而政治上的分歧正是国家兴盛的秘诀，这种人们还不熟悉的信念促进了英国的繁荣。虽然性质可疑，实现了这场变革的人物已经统治了三十年以上，尽管是用阴谋和反叛的手段，却成功地维持了公共秩序；英国建立起了庞大的国家信贷体系，并在与欧洲大陆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光荣革命以后，詹姆斯二世党人（Jacobite）的学说是欧洲君主制度的基础，他们得到过法国的支援，但是仍然未能撼动新建立的王朝。一个伟大的发现给一场伟大的试验锦上添花。一种公然反抗延续数百年的智慧的新颖思想站

（续上页注）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出身贵族世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出版第一卷，作者未完成第二卷就去世了），在这两本书里探讨了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检视平等观念的崛起使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摩擦。

稳了脚跟，革命已经成为比传统更可靠的确保稳定的准则。

孟德斯鸠着手梳理政治科学领域中被搞混的事实，试图让它们发挥作用。他重视政治科学，是因为它能让自己与君主制度的矛盾得到和解。他起初相信，国王全部是罪恶的，而且是不必要的恶，他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了。访问了沃波尔（Walpole）^①时代的英国以后，他有了一个新的设想，认为国王们的死刑或许可以缓期执行。他仍然承认共和政体是符合道德的统治形式；他所说的道德意味着热爱平等、放弃自我私念。然而他也看到了腐败堕落盛行的君主国家。他认为君主制度与众不同的特征在于荣誉，而不是道德。他曾经描述说，由于发明了荣誉，世界上的人可以不受惩罚地犯下几乎一切罪行。根据用气候和纬度解释习俗、制度和民族性格的著名理论，他称赞英格兰对法国人的爱国主义不会造成多少损害。孟德斯鸠考察了本国和外国政治，但是他没有更进一步：他擅长利用出色的技巧为一切正面的事实提供理由，然而这种技巧有时反而使他的事业陷入困境。他了解诸多对特权利益的诉求，以致他几乎忽略了没有特权的那个阶层，因为与教士没有交情，他赞成免除他们的特权。他觉得单靠贵族就可以维持君主制度，这使英国比任何国家都更自由。他宣布了伟大的保守主义格言：成功往往取决于知道需要多久才能成功；他的作品中最纯粹的辉格党人格言是：如果公民的义务遮蔽了作为人类该尽的义务，那么这种义务就是罪行——这正是芬乃伦的观点。他的自由是哥特式的自由，不是贪得无厌的自由。不过他作品中的格言“无母而生的婴孩”^②意在表明，人唯一应当追求

①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年），英国辉格党领袖，由于在议会中的地位被默认为英国第一任首相，任期从1721年至1742年。

② 拉丁文“Prolem sine matre creatam”，相当于英文“enfant born without mother”，引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神话史诗《变形记》。

的就是自由；他关于税收、平等和权力分立的想法，使他在1789年具有了划时代的影响力。他还告诫人们，单一的立法机关可能比专制的行政机构更加危险，然而没有人听从这个警告。1767年时，《论法的精神》已经失去了基础，而卢梭（Rousseau）的思想正在大行其道。这位作者的思想一直局限于他熟悉的社会环境，没有注意到即将来临的民主。他向大卫·休谟（David Hume）保证说，法国不会发生革命，因为贵族没有做公民的勇气。

达尔让松（d'Argenson）^①的预言相比之下更加准确，他是1745年左右上任的外务大臣，熟知政治的内幕。同时代的名人们只是默认革命的可能性，而他终生都在策划实行根本变革，他的作品最早反映了1789年大革命体制的影子。在他之前也有人察觉到革命的预兆；不过达尔让松曾经预言，这场革命将以在巴黎街头屠杀神职人员揭开序幕。38年后，他的预言在圣日耳曼修道院成为了现实。他支持觊觎王位者（指克伦威尔），没有受到亲英思想的影响；他没有把革命归咎于英国的自然神论者和辉格党人，而是归咎于分裂和不宽容的教会；他认为缺乏信仰的精神既是教会也是国家的威胁。在欧洲大陆，按照人们习惯的理解，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发动的起义，直到安妮女王驾崩，辉格党一直被认为是属于长老会派的。由此很容易推测，一场更加粗暴的神学论战会招致一场更加暴力的动乱。早在1743年，他就凭借可怕的先见之明看出政府将会崩溃，并且确信这种厄运，所以开始考虑在另一种统治下寻找避难的方法。他愿意罢免贵族、神职人员和律师，把他们的权力转交给群众。虽然政治科学刚刚诞生，但在处于初期阶段的启蒙思想基础上，他确立了理性的自由以及所有阶级和宗教一律平

^①达尔让松侯爵（René-Louis de Voyer de Paulmy d'Argenson，1694～1757年），法国政治家，作品被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引用过。